

## 文集



徐中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

第四卷

徐中玉 著  
查正贤 编

# 文集

# 徐中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徐中玉文集

## 第四卷 目 录

- 一、关于苏轼的五篇文章 1045
- 苏轼的“平生功业”(《苏东坡文集导读》代序) 1047
- 苏轼的一生 1052
- “观物必造其质”  
——苏轼创作的哲理性来源 1064
- 苏轼《东坡题跋》 1073
- 苏轼《东坡诗话》 1076
- 二、解放前古代文论的八篇文章 1079
- 古代的杂戏 1081
- 南朝何以为中国文艺批评史上之发展时期 1090
- 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1103
- 《文心雕龙》与《诗品》 1116
- 论诗话之起源 1130
- 中国文艺批评所受佛教传播的影响 1135
- 读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 1158
- 读郭绍虞著《语文通论续编》 1161

### 三、1982 年以来关于古代文论的十八篇文章 1165

- 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些问题 1167
- 略谈当前的古代文论研究 1182
- 简论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 1187
- 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需要革新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编后小记 1193
- 略谈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1195
- 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及其当代趋向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上的报告 1204
-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与美学思维形式问题 1211
-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1219
- 孔孟学说中的普遍性因素与中国文学的发展  
——1987 年 12 月 17 日在香港大学“儒学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1247
- 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  
——《论语》导读 1254
- 叶燮论“无胆则笔墨畏缩” 1288
- 《文心雕龙》“见异，唯知音耳”说 1292
- 严羽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陈定玉《严羽集校》序 1302
- 重印《刘熙载论艺六种》序论 1312
- 谈谈对金圣叹的褒贬 1325
- 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与“寻根” 1330
- 赏析不必有定论  
——《历代文学作品选析》序 1337
- 兼收并蓄，推陈出新  
——吴文治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题解》序 1342

# 一 关于苏轼的五篇文章



## 苏轼的“平生功业” (《苏东坡文集导读》 代序)

谈到苏轼这位生活在北宋时代,而在中国文艺史上却不愧是文艺方面独一无二的全能大家时,我总会联想到曹丕《典论·论文》最后这几句话:“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这些话是有所据而云然的,也不妨看为对文艺历史上这一现象的合理总结。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的例子,这是他认识到了的,而在他之后,则证据更多。就是对曹丕自己,今天大多数人所以还知道或记得他,并非因为他做过皇帝,而是因为他留下了《燕歌行》、《典论·论文》之类有价值的作品。那么对苏轼,这情况就更显著了。还在十年之前,苏轼不是遭到过他身后最集中最猛烈也最凶恶的一阵咒骂吗?“罗思鼎”、“梁效”这伙并非都属连苏轼文字都读不懂的白丁,只是由于利令智昏,才连起码的写作道德和诚实态度全抛于脑后,大骂苏轼是什么“典型的投机派”、“恪信儒家信条的孔孟之徒”、“大地主保守势力的代言人”,仅因苏轼的某些论点不合那些野心家的胃口,就想用诸如此类的咒骂来把他在我国文艺史上、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完全打倒,一笔抹煞。他们做到了没有呢?杜甫说得好:“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苏轼做过官,有的官职如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之类还不小,但他有抱负,有自己的见解,对他的见解尽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王安石当权时只要附和一下便可以做大官,他却不干,后来司马光上台了,他被目为旧党中人却又反对这匹“司马牛”的不顾实际、务以尽废新法为快的做法,以致一贬再贬,最后一直还被

贬逐到当时最荒远艰苦、“生理半人禽”的海南岛儋耳(昌化军、儋州,今儋县)去了。关心国事,却坎坷一生。陶渊明临终自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轼后来也说他“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与苏辙书》)对一个明知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一定会倒霉,却又宁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怎么能成了“典型的投机派”?难道竟有“自讨苦吃”的这样一种投机分子吗?

现在,十年过去了,不但苏轼的著作和研究苏轼的论著已大量重新出版或纷纷出现,凡苏轼留下行踪的地方也都已修葺一新,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和游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今天我们敬仰、记得苏轼,绝非因为他当过官,当过翰林学士和礼部尚书之类不小的官,而是因为他在文艺领域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卓越成绩,他的刚直平易而又达观、幽默的性格,以及他在历史条件允许下对老百姓办了那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一个封建时代产生的文人居然仍能在今天得到这么多群众的敬仰与爱好,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充分解释其原因,过去一套简单化的理论还未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确是值得继续探讨的。文艺创作原是一种异常复杂的劳动,“千古不朽”尤其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没有宽广的视野,历史的深层感觉,对民族文化和读者审美心理的理解,恐仍难于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可喜的是我们现在毕竟已经开始有了比较自由地进行研究的环境了。

苏轼是在1097年6月11日,从广东惠州贬所奉命再远贬到儋州而渡海抵达海南岛的。当时,他已六十二岁,去时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海南岛当时还非常穷苦落后,被目为蛮荒瘴炎之地,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致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去。苏轼明知这一点,故说:“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行前他也作好了死别的准备:“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已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海外。”(《与王敏仲书》)

等待着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答程天侔书》),又连书籍都看不到的比预料还艰难得多的苦况。诗人感到孤寂、渺茫、悲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恐怕连他自己也会觉得出乎意料,他竟逐渐安居下来,长达三年之久,不但并未死去,而且还深深地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感情。苏辙读了他的《儋耳》诗:“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非常欣慰地说诗句“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追和陶渊明诗引》)海南以后,诗人自己觉得有了个“今我”,与“故我”有所不同了,正是这“今



我”使他写出了下面这些与他初听要去海南和初到海南时情调大不相同的诗句：

他年谁作輿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吾谪海南……》）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墨庄漫录》引）

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鸩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拟古九首》）

徐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澄迈驿通潮阁二首》）

特别当他得赦北返时，好像对他的三年儋州生活作总结似的，这样说：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他回到镇江，游金山寺，又像给自己一生作总结一般，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要问什么是他的“今我”吗？以上这些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之词，就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虽然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即要离开他始终依恋的人世了。

黄州、惠州、儋州都是他的贬所，而且一处比一处都更加艰苦。为什么他没有把杭州、颍州，以及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高官的时期作为“平生功业”所在提出来呢？

那时有诗酒风流、官场酬应、左右逢迎，诚然热闹非凡，但他坎坷的一生，频繁地触犯世患，以致抱负落空，刚直难伸，也是在那些时期遭受到的。回顾一下过去的生涯，究竟算立了什么功业？没有。倒还是在这几个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中存在真淳质朴的感情，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却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比较起来，他大概体会到了这是在通都大邑中、在他原来接触的许多达官贵人中，怎样也难于得到的。他带着这样的憬悟回到繁华地区来，一点没有动摇：“东坡自海南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

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都写了不少诗文。他的同情生民疾苦，揭露政治黑暗，反对民族压迫，进行自我批评的作品大多就是在这些地方写成的。《荔支叹》作于惠州。《余米》作于儋州，可见其“今我”一斑：

余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春秧几时花？夏稗忽已穗。怅焉抚耒耜，谁复识此意？

其《和陶劝农六首》：

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其一）

……贪夫污吏，鹰鸷狼食。（其二）

反映汉、黎两族，同属一家，原应平等相处，斥为鄙夷不训，是不真实的，引起纠纷，曲都在汉族统治者，尤其那些贪官污吏，害人不浅。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他的民族团结、融洽无间的感情，不是表现得非常出色吗？

那么，苏轼所谓“平生功业”，我认为，就是指他在这些贬谪之地的作为。正是在贬谪生活里，苏轼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真淳朴厚的感情，自食其力的可贵。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文中也反映了出来——同情生民疾苦、揭露政治黑暗、反对民族压迫、进行自我批评……他觉得这才可算是一生中对国家多少做了一些真正好事。无论对国家，对民族，对他个人一生，这样的思想，作品，无疑都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

当然，在这三个地方，苏轼还力所能及地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其他有益的事情，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乐道。

苏轼思想上的这个转变，特别在晚年被贬时期，主要是因为同平民百姓非常接近了，对平民百姓的生活、思想、感情有了较深的理解，并在较大程度上同他们有了休戚与共的关系才逐渐达到的。他最后把“平生功业”寄托在这些地方的所作所为的思想，实在是当时条件下一种非常光辉的思想。我认为发扬光大他这种思想，对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比只顾到自己，以远离社会人生、群体

哀乐为高的思想,实在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我们现在读他的作品,应该把握到他这种精神品质。

1988年12月在上海

(原载《苏东坡文集导读》,为此书的一章,巴蜀书社1990年版)

# 苏轼的一生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我国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全能文艺家。他一生兼擅诗、文、词和书画，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名字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直到现在几乎仍妇孺皆知。作为一个才情横溢的文艺家，苏轼在文艺园苑里随心所欲、左右逢源，似乎走的是一条辉煌而又顺畅的坦途。其实，他的一生遭际却是荆棘丛生，经受了漫长的人生磨难的。在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上，他不畏艰辛，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有所追求，又始终豁达自持，才使他获得了文艺上的巨大成功。

## 一、苏轼的少年时代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6年)夏历十二月十九日，苏轼诞生在四川眉山纱縠行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里。

四川素来是壮丽发达的天府之国，眉山还是风景佳胜之地，这里西南有雄伟的峨眉山，岷江又由北向南纵贯全境。在富饶的四川盆地中，眉山果然是一个“孕奇蓄秀”之地，陆游曾在一首诗中称赞它：“蜿蜒回顾山有情，平辅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眉山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苏轼在富饶美丽的自然环境孕育下，对大自然怀着深切的爱恋，歌咏山水之美成了他一生文艺创作的一个突出主题，这不是偶然的。

苏轼的家庭是一个文学世家，祖父苏序“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他的两位伯父苏澹、苏涣也“皆以文学举进士”，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当然莫过于父亲苏洵了。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

人”(曾巩《苏明允哀词》),但为学之路却颇为奇特,“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洵)墓志铭》)。他自己也宣称“昔予少年,游荡不学”(《祭亡妻文》),一直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闭门谢客,然而科举之路颇不顺利,屡试不中,因而“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奋发淬厉,老而弥笃,直到晚年,他才声誉鹊起,文章名震天下。苏洵一生对苏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那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毅力,他那积极用世,不务空言的人生哲学,他那纵横驰骋、博辨宏伟的文风都在苏轼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也许是鉴于自己少年不学,老大难成的教训,苏洵从小就对苏轼进行了细心的培养。

苏轼是苏洵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在苏轼之前,程夫人曾生过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苏轼的两个姐姐和长兄都早卒,幺姐八娘也在十八岁时郁郁而死。在苏轼的少年时代,除了苏洵之外,其母程夫人也对他进行了悉心的教育。少年苏轼所受到的家庭教育非常好,他自己也知道应该刻苦好学,尝言:“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园葵。”(《送安惇秀才失解而归》)

苏轼聪颖好学,多思早慧。八岁进乡校就学,三年后又至城西寿昌院,从学于刘徽之。刘尝作《鹭鸶诗》,末联“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颇为自得,苏轼却认为:“逐风斜”未能写出鹭鸶归宿,不如“雪片落蒹葭”为好,使徽之有“吾非若师也”之叹。十来岁时,苏轼即能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样的警句,得到父亲的叹赏。

苏轼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宁静、安适的生活中度过的。主要活动当然是读书学习,他在外从师,在家则“师先君”,学习上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他很早就学习写诗,且已表现出具有广泛的兴趣:对《诗经》、孔孟、老庄、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都全面涉猎,博观约取。在众多的文学家中,他诗以李杜为尊,文则以孟子、韩愈作为主要的学习对象,庄子对他也有特殊的影响。除此之外,苏轼在少年时代还常常以琴棋书画自娱,在书画方面下过苦功,到了“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画”的境界(《宝绘堂记》)。深厚、广博的思想、文艺修养给他奠定了后来成功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苏轼与弟弟苏辙相处极为亲密,两人在学习上互相切磋,在生活上形影相随,他们常常一块出去登临山水,陶醉于山水风物之间。他尝谓:“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送晁美叔》),他们这种无比深厚的兄弟情谊不但一直保持着而且老而弥笃,成为在坎坷道路上互相支持、互相劝慰的

巨大力量。

公元1054年，苏轼十九岁，与邻县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成婚，她聪颖而沉静，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陪伴苏轼读书“终日不去”，对苏轼的关心体贴更是无微不至；苏轼对她也是感情深厚。不幸，这位贤内助在二十七岁时便过早地病逝了，十年后，苏轼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一词，表达了他对亡妻深切的哀痛，其中末两句尤为真切感人：“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 二、初入仕途

公元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结束了家乡平静、安适的学习生活，在父亲的带领下，与弟弟苏辙一起上京应试。他们经阆中出褒斜谷，过横渠镇，入凤翔，历长安，终于在五月到达了京城开封，开始走上了求仕之途。

对于科举，苏洵也有过追求，但几经落第，终于“绝进取之意”，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苏轼也曾立下“书剑报国”的宏愿，想通过科举入仕，从而施展自己的才华。

等候苏轼的是一场考试的角逐。当时的进士考试品目繁多，大致要经过举人考试、礼部考试、复试及皇帝御试等几次筛选。同年九月，苏轼顺利地通过了举人考试，次年二月，他在礼部考试中以短短六百余字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圣俞的赞赏，梅赞其文章有“孟轲之风”，欧阳修更“惊喜以为异人”，接着的礼部复试，苏轼又以“春秋对义”获第一，三月仁宗殿试，他终于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二十二岁。

相对于他父亲来说，苏轼在科举考试中是十分幸运的。他所以能得欧阳修等人赏识，一方面固由于他的政治思想与欧阳修等人的主张相吻合，同时也由于他的文章风格正符合于欧阳修等所倡导的古文革新的要求。欧阳修所主持的这场“贡试”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实际上，这是一次有意识地对宋初文坛颓风的反拨。苏轼在《上梅龙图书》一文中申言：“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可见，苏轼以“无所藻饰”之文来矫正“浮剽之文”，与当时古文革新运动的需要是正相合拍的。就在苏轼兄弟中举的同时，其父苏洵的文章也经欧阳修的荐举而名震天下，于是，“三苏”之名传扬天下，“时文为之一变”。

苏轼参加的这场“贡试”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开端，不仅使他顺利地叩开了仕途的大门，又为他步入文坛开启了道路。前程对他来说似乎应该是很快会辉煌而又腾达起来的。按惯例，苏轼中举后即可授官，然而正当他充满成功的喜悦时，家中却传来了噩耗——母亲程夫人已于四月八日病故。苏轼当然只能跟随父亲立即离京，返家奔丧。直到两年后除了丧，父子三人再度进京，苏轼才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这是苏轼仕途上的第一个官职。但苏轼并未赴任，在欧阳修的荐举下，他又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而举行的临时性考试，苏轼参加的是“直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的前后，苏轼写了下列这些文章，全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策二十五篇，论二十五篇，《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以及皇帝御试的《御试制科策》一篇。这次考试，苏轼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入三等”，而宋王朝建国以来，“入三等”者仅有二人。

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写下的这些政论文章，是青年苏轼在仁宗朝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苏轼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态度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并对他以后的经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一次他在政治主张、处世作风和人格节概上的全面展示，直到晚年，苏轼对此仍未忘怀，尝言：“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

苏轼对当时现实政治的看法是颇为深刻的，他认为北宋王朝表面升平，实则危机四伏，社会现实乃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此时，宋王朝已经历了将近百年的相对稳定，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的北宋文化也出现了普遍的高潮。然而，在这表面承平的背后，却掩藏着深刻的危机：土地兼并，机构臃肿，皇室糜烂，再加上辽、夏的进逼和朝廷的妥协，使北宋王朝危机四伏，“天下之势，岌岌乎将入深渊”（苏洵《审敌》），于是朝廷有识之士纷纷提倡改革。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书仁宗，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方案。苏轼在制科考试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原也是顺应了这股时代的风潮的。他主张“涤荡振刷”，要求朝廷“卓然而有所立”，在对现实政治的总态度上，苏轼明显地也要求变革，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然而，在如何变革和变革的步骤上，苏轼与王安石的看法却颇有分歧，他反对“因循苟且”，但也反对“鲁莽从事”，也就是说，他不主激变，而崇尚微变、渐变。苏轼以后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挫折，于他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便已埋下了种子。

在这场制科考试中，苏轼表现出了他那种态度鲜明、独立思考而不随风使

舵的政治品行。他对现实的批评极为犀利，“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甚至还公然指责仁宗无所作为，“未知勤”、“未知御臣之术”。这种作风体现了苏轼的性格，他认为，为人要正直，不可随风倒，“自知其不悦于世”而仍不顾。这种性格成了苏轼一生坎坷的内在因素。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曾表露了他对苏轼性格的认识和忧虑：“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从苏轼一生的遭遇来看，苏洵的忧虑显然是不幸而言中了。他这种豪荡不羁的性格在他刚步入政治舞台时便已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通过这场制科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一个以京官身份充任州府判官的官职，是苏轼实际从政的开始。他在任上很想有所作为，现实却使他常常失望，情绪并不高扬，反而不时表现出消极、凄恻的情绪。苏轼在凤翔共四年，公元1065年回到京师，入判登闻鼓院。在这以后，不幸之事接踵而来，先是妻子王弗在京逝世，次年父亲苏洵又病故，于是，他偕弟返蜀，再次服丧于故里。

### 三、在变法的旋涡中

公元1068年7月，苏轼服丧期满，不久便与前妻的堂妹王闰之成婚，十二月，偕弟再度进京，这是苏轼一生中的第三次出川，他当然料想不到，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归自己梦魂久萦的故乡了。

次年二月，苏轼回到京城，此时的朝廷政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岁的神宗继位，他年富力强，很想有所作为，变法活动已经是紧锣密鼓了。王安石首先建立了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接着便全面推行均输、青苗、免役、水利等新政，一场变法的浪潮席卷了朝野上下，变法与否和究应如何变法成了当时争议的主题，苏轼自然地会卷进这一场轩然大波。

苏轼在仁宗朝就提出过变革的主张，但在如何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的意見存在分歧，不过由于地位不同，两人间还引不起什么对立冲突；随着苏轼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变法已真正提上日程，王安石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苏轼一回到朝廷，他与王安石的对立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变法与反变法在朝廷里引起了汹涌的波浪，随之而来的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剧烈、深刻的分化。王安石迅速大量提拔组织了一批位卑职微但表示紧跟变法的人物作为变法派的依靠力量，被称为“新党”。反变法者如司马光等则纷



纷与王安石决裂，采取积极反对或不合作的态度，有的被迫下台，有的出任外职。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苏轼也对王安石的主张不满，如反对设置三司条例司，反对农田水利法、青苗法、雇役法等等，认为“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他鄙视新党的人和事，称作“新党小生”、“小人招权”、“怀诈挟术，以欺其君”。

不过，我们也不能由此就把苏轼与那些完全反对变法的旧党视同一律。从总的倾向而言，苏轼也是主张改革而反对因循守旧的，他与王安石的分歧并不表现在要否改革的问题上，而是表现在变法的理论和方法上。苏轼的这种态度并不是由于变法触及了他的自身利益，而是出于他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一贯的政治主张。苏轼在神宗朝反对变法与他在仁宗朝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的原因是一致的，比如在“任人”和“法制”的关系上，苏轼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这是他在仁宗朝的观点，同时也是他在变法的激流中反对变科举、兴学校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则。再如在改革的步骤上，他也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这种观点与他在仁宗朝时提出的“见之明而策之熟”，“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的渐变主张出于一辙，可见苏轼的某些变法的主张有其思想的一贯性，他决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思考有素的东西而随波逐流，分明“自知其不容于世”亦不改变。这正是苏轼品格上的闪光之处，却也是他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生遭遇坎坷的重要因素。不消说，苏轼思想中确有较为温和和复杂的一面。温和的改良和持重的施政始终是苏轼政治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在这场变法的激烈斗争中，尽管遭到了许多阻碍，由于客观上有此需要，加上得到皇帝的支持，基本上按王安石的主张推行下去了。苏轼在郁郁不得志之中通判杭州，这是公元 1071 年，时年 36 岁。

苏轼离京外任，显然由于政见不合。“眼看世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欲仕不能有为，欲罢不能超脱的矛盾心理纠缠着他的心灵。幸好杭州是一个风景秀丽之地，使他得以寄情于山水，多少排遣内心的苦恼。作为一个地方官，两年多的杭州通判，苏轼还是有所建树的，他当然不能不执行新法，但往往加以灵活运用，因法以便民；他还不时地深入下层，了解民众的生活实况，对农民有甚深的同情，“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组织捕蝗、赈济灾民，诸如此类，为杭州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公元 1074 年，苏轼奉命移知密州，两年后，复知徐州。这样，从 1071 年通判杭州到 1079 年 3 月离开徐州，八年的外任，使苏轼有机会接触各地情况，较深地了解现实社会，广泛地体会民情。这对